



福建历代作家评传

● 主 编 陈石怀
● 副主编 何绵山
连诚谦

● FÚJIAN LIDAI ZUOJIA PINGZHUAN ● 福建教育出版社 ●

608
福建历代作家评传

主 编：陈石怀

副主编：何绵山 连诚谦

出 版：福建教育出版社

(福州大梦山7号)

发 行：福建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霞浦县印刷厂

850×1168 1/32开本 19.875印张 480千字

1990年9月 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4,300

ISBN 7—5334—0612—5/K·29

定价：7.70 元

主 编 陈石怀

副主编 何绵山 连诚谦

编 委 （依姓氏笔画为序）

陈欣海 陈裕水

陈德理 欧阳少鸣

林启瑞 黄建国

蒋水石

责任编辑 杨 树

封面设计 从 容

序

许怀中

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，必须建设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。这种新文化的建设，不可能在空地上凭空建构，也绝不能无批判地照搬西方文化的所谓“全盘西化”所能实现。它必须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地上进行，离开这个基地，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，将是一句空话。当然也必须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积极成果。

民族文化，有个鉴别问题。正如列宁所指出的，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：“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，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，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，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。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……”（列宁：《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》，《列宁全集》第20卷第5页）我们所要弘扬的，正是它的精华部分。同时，弘扬和创造、创新，是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。

问题是，在民族虚无主义的声浪中和它的影响下，提倡弘扬民族文化，更有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。

文学艺术是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民族文化，又和地域相关连。它是地域文化的有机总体和整体，又由不同地域文化组成。可以说，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总流中的分支。

福建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文学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。从

上古到南北朝，福建古典文学已经形成和初创。到了东晋，已出现被王羲之所器重的福建文人廖棠。梁朝的江淹，顾野五等流寓福建的作家，留下一些名篇。

隋唐五代时期，福建文学进一步得到发展。在唐诗的繁荣中，福建诗歌也是辉煌的。散文、杂记、辞赋之类的文体日益兴起，这给福建文坛带来繁荣景象，欧阳詹、黄滔、陈陶、顾仁郁等作家作品，充实了福建文学的仓库。外地来闽的作家韩偓等的创作，也给福建文学增添色泽。

随着宋室南迁，中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南移，福建文化更臻繁荣昌盛。福建词史是宋词中光辉的一页。各种文体，特别是散文，进而成熟。小说也开始活跃起来。宋代著名作家、诗人，多得不胜枚举，如杨亿、柳永、蔡襄、李纲、张元干、刘子翬、王迈、刘克庄、真德秀、谢翱、郑思肖、黄公度和流寓名作家诗人陆游、辛弃疾、文天祥等，都为福建文学的殿堂增添了光辉。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，标志着福建文艺批评专著的发展，显示了文学批评的突出成果。此外，如元代的作家洪希文等，也应提到的。

明清时期，福建文学走上全面繁荣。明初出现以林鸿为首的“闽中十子”、“台阁体”的领袖杨荣，以及后来的王慎中、李贽等。此外，民族英雄俞大猷、谢肇淛、黄道周、女诗人蔡玉卿等，皆是文坛的佼佼者。清代则有黄任、华岳、黄慎、陈梦雷、李光地等。外来的作家极多，如明代“后七子”中的宗臣、吴国伦、徐中行、徐霞客等。此外还有“竟陵派”的首领钟惺，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等，小说逐渐繁荣，出现长篇小说的楷模。历代民间文学，都为福建文学提供丰富的成果和营养，到了这时期，民间文学，特别是戏曲，更加蓬勃地发展了。

鸦片战争到“五四”前，梁章钜、林昌彝、林则徐、魏秀

仁、张际亮等的诗文是令人瞩目的。严复、林纾的翻译，在近代文学史上更有它不可低估的作用。革命作家诗人林觉民、林文、陈子范等表现民主革命精神的篇章，在福建文学史的史页上发出光芒。还有陈衍、陈宝琛的作品以及魏子安的长篇《花月痕》，都应给予一定的地位。

从上面粗略的勾勒中，看出了福建文学在发展过程中，对文学史、文化史的贡献。

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写出一部具有“史识”的地方文学史，而不是福建作家简单的罗列，这是一项重要的课题。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福建历代作家评传》，是研究的可贵成果，又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推动。从福建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勾勒出福建文化的特点，由此揭示出福建文化对福建作家的影响，最后归结出福建作家的创作特点，这在《前言》中已经做了，我就不再赘述了。

我期信，这本书出版之后，能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目。

1990.5.14

闽文化与福建作家（前言）

何绵山

一 闽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。

闽文化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时间、异常复杂的过程。从总体上看，它的形成与以下几个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。

中原文化的传入。其传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：（一）大量移民。中原汉族曾多次大规模进入福建，如：1. 西晋末年的八姓入闽。这八姓多为中州的簪缨世胄，有较高的文化素养，他们为避免永嘉之乱而携眷南逃，都带着自己的宗族、部曲、宾客等，大大增加了福建地方人口。2. 唐代陈元光开发漳州。河南光州固始县人陈政于唐总章二年（669年）率府兵三千六百多人进入漳州，年仅十三岁的陈元光也随父进漳，二十一岁时承袭父职，定居漳州，并大力开发漳州，使漳州改变了昔日满目榛莽的荒凉状况，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迅速发展。3. 唐末五代王审知治闽。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曾与其兄一起率中原人马五千余人入闽，定都福州，后被封为“闽王”。他为治理福建作出了卓越贡献，使福建在中原动乱之际成为东南的富裕之邦。4. 北宋南迁。宋室南渡前后，北方百姓为避战乱，再次出现南迁浪潮，大批人扶老携幼入闽，使福建地方人口急剧增加。除了这几次大规模入闽外，从永嘉之乱前到明清，都有中原人士陆续入闽定居。早期这些入闽者大多为逃亡或流放者，后期多为驻闽将士、赴闽仕宦，和为避乱而投亲靠友者。唐五代时河南固始来投奔王审知的，多

不胜数。福建历史上的四次大移民和这些陆续进入的大量移民，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，加快了福建的开发和进步。（二）名士南下。从唐德宗常袞任福建观察使起至明清，大批中原名士或慕名前来投奔，或为闽地秀丽山水而至，或前来授课讲学，他们虽然没有在闽定居，在闽时间也不太长，却在流寓之中不废吟哦，活跃启沃了闽地学术文化。如晚唐五代就有杨承休、郑璘、李洵、韩偓、崔道融等名士到过福建，宋南渡之后，大批北方名流更是蜂涌而至。这些名士的到来，对闭塞的福建文化有极大的影响。（三）闽人北上。唐中期之后，闽人开始中进士第，因此纷纷北上，他们宦游归里时带回了中原文化。此外，不少闽人北上访学，也将中原文化带回闽地。如理学开创者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邵雍等都在北方中原一带，不少闽人投奔其门下，深受其影响。崇安人游酢，将乐人杨时亦受业于二程，曾有“立雪程门”的故事。他们返回闽地后大力传播理学，后被朱熹改造发扬为“闽学”。

邻省文化的渗透。福建北连浙江，南接广东，西临江西，这几个省的文化对福建长期渗透影响很大。（一）历史沿革。福建在唐以前称作“七闽”，其活动范围除了福建全境外，还北涉浙江温州，南入广东潮州，西接江西余干。春秋时期的越国为楚所亡后，纷纷进入浙江南部与福建境内。秦始皇时期设置闽中郡，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区域建置，其辖地北部仍达浙江温、台，处三府，西部接江西铅山。汉代刘邦设闽越国，其辖地仍跨有赣东、浙东、粤东潮梅等地区。三国时，占据江浙的孙权把福建作为吴会的后方基地，置建安郡。唐玄宗时，取福州、建州各一字名为福建经略使，从此有了福建的名称。从历史上看，福建有不少辖地曾是今天邻省的辖地，因此与它们的关系始终很密切。（二）交通往来。唐中期之后，闽人与外界接触逐渐频繁，因应

试、为宦、从商、访学等原因北上外出者增多，浙、赣则为外出的必经之路。宋代，建州著名的分水关路由江西抵浙江，然后再北上，因此闽、浙、赣、粤客商云集，文人间来往也较为频繁，如黄昇深受姜夔的影响，李虚已常与婿晏殊唱酬。明代闽地与江淮流域的交通也很发达，或由建阳往邵武入赣，或由浦城入浙，或由崇安入赣浙。这些往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，也促进了文化的相互融汇。（三）互派官吏。闽人热衷科举后，不少人被派往浙、赣任职，亦有不少浙、赣官吏在福建供职，这些都对文化的相互渗透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海外文化的影响。福建东临大海，良港棋布，有占全国五分之一长的海岸线，因此很早就与海外有联系。海外文化在福建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：（一）国际商业贸易。早在王审知治闽时，福建与海外就有商业贸易往来。北宋时，泉州便成为国际贸易港，被称为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，与三十六个岛国有贸易关系。福建商人由泉州出发前往海外，一般一年往返，远的二年往返，用五色绢绢和建本书籍，与海外交换所需之物。到了南宋和元代，泉州便发展为世界第一商港。明代统治者厉行海禁二百年之久，但位于龙海的月港依然帆樯如栉，海外客商汇聚，成为全国最大的走私港。明隆庆元年取消海禁后，月港每年孟夏之后，数百艘商船远航四海。到明万历年间，月港的国际贸易更为繁荣。（二）外商定居闽地。特别在宋元两代，数量极多的印度人、波斯人、阿拉伯人、欧洲人为繁华的泉州所吸引，定居当地而不返，被人称为番客，娶本地妇女所生的孩子，叫做半南番。他们将本国的风俗民情信仰融汇在当地居民之中，日长天久，海外文化便与当地文化水乳交融地渗透在一起。（三）闽人外出定居。几乎与闽人出洋同时，就有人定居海外，宋元之后，逐渐增多，几乎遍及日本、朝鲜和整个东南亚。明代数万闽人出海后

“往往久居不返，至长子孙。”（《明史·吕宋传》）十七世纪前后，东南亚的福建华人已在五十万人以上。福建华侨和华裔约有五、六百万，仅次于广东。这些华侨大多与家乡保持程度不同的联系，并时时有不少人回里探亲，带来了形态各异的海外文化。

宗教文化的传播。宗教在福建极为兴盛，传播速度极快，对闽地影响最大的宗教主要有四种。（一）佛教。佛教传入中国约在东汉初年，而西晋武帝太康三年（282），福州正处于开发之际，已有了“绍因寺”佛寺。晋太康九年（288），南安也有了“延福寺”。唐代马祖道一禅师入建阳，是闽地禅宗的开端。当时佛教宗派林立，主要有盛于北方的渐悟和盛于南方的顿悟两支，故有“南顿北渐”之说。唐中期以后皇帝发布诏令，禁止佛教活动，当时全国强迫和尚尼姑还俗的有26万人之多。福建远离政治中心，天高皇帝远，佛教反而日趋兴盛。“顿悟”到唐末能衍为五宗，与福建有极大的关系，如临济宗的始祖义玄是福清人黄蘗的门徒，沩仰宗创始人沩山是长溪人，曹洞宗创立人曹山是莆田人，立云门宗的文偃、立法眼宗的文益均出于南安人义存门下。当时福建名僧长乐人怀海、南安人义存在全国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，誉满佛林，并出现了不少佛教著作，如莆田释文矩的《博山经》、仙游释叔端的《宗镜边缘》、建州释慧海的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，南安释义存的《真觉语缘》等。王审知治闽时笃信佛教，在闽地建佛寺二百六十七座。闽侯雪峰的崇圣寺为全国十大名刹之一，厦门的南普陀寺，泉州的开元寺、承天寺，闽东的支提寺，闽北的孝光寺等都为当时名寺。由闽王发给文凭的出家僧尼，竟有三万多人，故有“山路逢人半是僧”之诗。在唐五代时，福建的佛教已极为普及，所以宋元明清直至近代，佛教在福建始终没有衰竭过，如宋末元初，仅福州府统辖的各县，就有

佛教寺庙一千五百座以上，这在全国来说也是罕见的。福建名僧不但常奉诏晋京，授经讲法，还常飘洋过海，如唐代泉州超功寺僧昙静，曾追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；元代的明极、楚俊等曾赴日讲经；明代漳州名僧觉海赴日本长崎传法，并在长崎建有漳州寺。（二）道教。早在唐以前道教就开始传入闽地，福建武夷山洞，曾被列为道教“三十六洞天，七十二福地”的第十六洞天，称为“真升化玄天”。到了唐代，福建出现了道坛庙观和职业道士，福州著名的道士有张林、符契元等人。五代时，王审知敬重道士，不少道士握有大权。宋代福建道教发展很快，不少道士屡受朝廷赏赐，到处都出现新建道教庙观，著名的如福州“真庆观”、延平“元妙观”、莆田“元妙观”、闽县“崇禧观”、沙县“宜福观”、松溪“文昌观”等。泉州清源山上巨型石刻李老君像，高约一丈五、六，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，由此可看出当年道教的兴盛。（三）伊斯兰教。公元七世纪初在阿拉伯麦加城诞生的伊斯兰教，早在唐中叶就由航路传入泉州，宋元泉州跃为东方大港后，数以万计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云集泉州，使之成为我国最早的三个伊斯兰教区之一。不仅金、丁、马、铁、郭、葛、黄、夏、蒲等十多姓的穆斯林后裔在这里生息繁衍，还建造了极具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清真寺，安葬伊斯兰先贤的灵山圣墓等，并留下了许多刻有阿拉伯文、波斯文和中文的墓碑铭文。此外，元朝时还有不少伊斯兰教徒跟随西域金吉军队经邵武到福州，并在途中安家，至今邵武还有不少伊斯兰教徒。福建的伊斯兰教从属于人数最多的逊尼派，在教法上崇尚哈乃斐法律学派。（四）基督教。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传教士进行的。早在南宋时，意大利方济各会的天主教神父德里·包戴诺与修女爱尔兰·雅各伯由海道在泉州登陆传教。明代时，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等在明大臣叶向高的支持下，到闽北传教，并向福安、闽县

等地发展，前后达二十四年，建有教堂二十三所，艾儒略曾被称为“西来孔子”，誉为开教福建第一人。明末，菲律宾教省派传教士十一人抵厦门、福州，开创“多明我会”传教区，发展迅速，郑成功还曾聘传教士为老师。康熙年间，以白伯多禄为首的一批传教士，深入泉州、兴化、福安等地传教，先后在福建成立“圣多明我第三会”。鸦片战争之后，西方的不同派系的传教士在福建展开激烈的传教竞争，基督教建的教堂和学校、医院、救济机关，几乎遍及城乡各地。无论从传教和建教堂时间上看，还是从教派、教徒和教堂数量上看，福建都居。较早，也较多。

闽文化与中原文化不同。中原文化据有正统性、传承性、稳固性、辐射性，源于本地的正宗文化对外来文化有很强的征服、融解能力；闽文化与相邻的浙、赣、粤文化也不同，这些相邻地区的文化虽然也不断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，却能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板块。闽文化既没有中原文化中那种征服力极强的正宗文化，也缺乏相邻几省文化中的那种可融性。它虽也有可融性，但融合过程缓慢，因而各种文化长期并存，形成一种碎状割据的文化形态。所以要确切地给闽文化下一个定义或概念，是很困难的。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有三：一是外来文化相继进入福建时间最长，甚至在福建还是土著民族时代就已开始，因此无法形成本地坚不可摧的“文化硬核”。二是进入福建的文化成份极为复杂，即使是中原文化，差异也很大，中原来闽人士中，既有文人学士，也有起于田间的王潮兄弟。何况除了这四种文化外，还有其它文化对福建的渗透。三是福建地势复杂，既被称为“东南山国”，又被称为“闽海雄风”。一方面山区极为闭塞，甚至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；另一方面海港船只远航世界，常领风气之先。交通的不便和文化的差异，都极大地限制了文

化的交流。

闽文化的碎状形态,首先表现为难融性。具体如:(一)语言复杂。福建汉语方言的复杂性在汉语诸方言中是少有的,在全国八大汉语方言中,福建方言就占三种,如果加上省界交叉地区,仅福建境内流行的就有汉语七大方言,可以说是全国汉语方言的缩影。而关键在于其方言内部也极为复杂,同一个方言区内部,如闽南方言区中的厦门话同龙岩话、大田话、尤溪话之间也有很大差异。有的县或公社内,竟没有一种统一的方言,甚至有的地方过一重山,一条水就不能通话。这种现象在全国是罕见的。

(二)民俗各异。如莆仙沿海一带信仰妈祖,以至使之成为东南亚乃至世界渔民心目中的保护神。湄岛渔民因每年三月二十三日为妈祖诞辰,故前后数日内不下海捕鱼,而有些山区对妈祖却一无所知;闽东山区有的村落每年十月祭多贝大王等习俗,亦为沿海人所鲜知。(三)风气相佐。比如莆田一直视读书习儒为首要之事,故“诗书礼乐为八闽之甲,莆之科目,肇于唐,盛于宋,又盛于明,每科与试者,视闽居半,”(胡朴安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上编)有的地方则弃儒从商,以贾为业,如“福清背山面海,多潟卤,有海舶之利。其人刚劲尚气,多行贾于四方,以其财饶他邑。”(何乔远《闽书》)这种风气,沿续至今。(四)良莠共存。《宋史·地理志》曾称福建“向学喜讲诵,好为文辞。信鬼神祠,重浮屠之教。”一方面重教育,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;一方面又信鬼神,以至有人叹道:“中国人迷信鬼神,崇拜偶像,各地皆有此风,不足为奇。惟闽人倭鬼,想入非非,有出寻常意料之外者,其种种动作,皆足令人绝倒。”(胡朴安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下编)

闽文化的碎状形态,还表现为不平衡性。(一)人才发展不平衡。福建人才不是在各区域同步发展,而是呈极不平衡状况。福

建杰出人物最早主要集中在福州、莆仙、泉州一带，近代却几乎都崛起于福州的侯官和闽县（这两个县于1912年合并为闽侯县，属辖福州），侯官崛起的这些杰出人物有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、外交家、思想家、翻译家等，门类齐全，如林则徐、沈葆楨、林纾、严复、林昌彝、陈寿祺、陈衍、方声洞、林觉民、林旭等，故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。如果没有这些杰出人物，那么福建近代文学史、文化史就会成个空白，中国近代文学史、文化史也将黯然失色。在一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弹丸之地，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崛起如此之多的杰出人才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（二）经济发展不平衡。如闽东、闽西、闽北一些山区经济发展缓慢，甚至长期连糊口都成问题，而另一些地区如福清、晋江等却能领风气之先，往往在经济旋涡起于青萍之时就卷进去。特别是一些海外文化特征较为明显的地方，如晋江陈埭镇的居民有不少是海外来泉州的伊斯兰生意人的后代，他们又有二千多人远涉重洋到国外去，在家者则长期从事远销蛭苗等商贾活动，商品意识极浓，沿绵至今。（三）文化艺术的不平衡。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，导致文化艺术发展也不平衡，而越是不平衡就越难互相融汇，这又造成了福建文化艺术的鲜明性和丰富性。比如福建不像其它省市那样，有一种或几种为全省人民普遍接受的戏曲（如北京的京剧、江浙的越剧、安徽的黄梅戏、四川的川剧），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戏，很难说哪一种戏最能代表福建。除流行于福州、南平、莆田、仙游、泉州、厦门、漳州等主要城市的闽剧、莆仙戏、梨园戏、高甲戏、芗剧这五大剧种外，还有二十多个大小剧种流行于各山区沿海，今日可查的地方剧传统剧目多达一万五千多个，素有地方剧省之称。正是由于福建的地方剧很难互相交融，所以在莆仙戏、梨园戏和南曲中，始终保留着一些宋元南戏的剧目，一些古本和古曲在全国其它剧种中早已绝响，而

唯独在福建能听到它的遗音。八闽大地真是个巨大的文化艺术遗产的聚宝盆。

二 闽文化对福建作家的影响。

闽文化对福建作家有着极大的影响，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科举考试使福建作家有机会走向全国。福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，较其它省闭塞，缺少思想文化交流，福建作家想在全国产生影响，只有走出福建，得天下风气之先。而科举考试为闽籍作家提供了走出福建的绝好机会。综观福建作家，几乎都经过科举，并多为进士，这是外省不曾有过的奇异现象。中唐以诗赋取士，吟咏之风气始兴于闽地。虽然唐代福建正处于开发阶段，但已有75个闽人登进士，其中不少人都有自己的诗文集，如欧阳詹的《欧阳行周文集》，周匡物的《周几本诗集》等。宋代福建科举更为兴旺，登进士约有七千余人，占宋代进士总数五分之一，被《宋史》收入的名人中，福建人数最多。这些进士中云集着最优秀的文学人才，他们的许多诗词文曾传诵一时。明清两代，福建的科举也始终未曾衰落过。科举考试为一些福建地处僻壤的贫寒之士提供了仕宦的机会，对福建作家的影响更为深远。首先，它开拓了福建作家的眼界，福建作家可藉此结交名流，切磋艺术，遍读珍本，广泛汲取闽地所没有的各类文化。其次，它丰富了福建作家的创作题材。应京赶考、跋山涉水、沿途所见，及及第后互相酬赠，上任后宦海沉浮，落第后失意愤懑，都成了创作了好题材。再次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学氛围。同场考生，同乡文人，同榜进士，或相互激励，或同病相怜，或孤芳自赏，往往结伴成社，吟咏赠答，蔚然成风。福建各种应试文人结成的各类文学社团数不胜数，虽大多为昙花一现，却也或多或少地推动了当地的文学创作。

重视教育使福建作家有较高的文化素质。文学的兴盛和人们的文化素质高低有很大关系，而文化素质又与教育是否普及有着直接关系。福建历来被称为教育之乡，对教育的重视，在闽地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。早在福建还处于开发期的唐代，任福建观察使的常袞就倡设乡校，以五经训民，使福建“一年人知敬学，二年学者功倍，三年而生徒祁祁。”（《昆陵集》卷九）建州刺史叶京极力兴办教育，鼓励州人入学，闽人以不学为耻，一时成了风气。唐大历年间出现了设于莆田的“澄诸书堂”，继而有欧阳詹的“福平书堂”和古田县的“兰田书院”。五代时，王审知曾下令各州县都要创办地方学校，并在福州设立“四门学”高等学府，使闽国“幼已佩于师训，长者置于国庠。”到了宋代福建的教育更为兴盛，官办的州县学有56所，私办书院有75所，朱熹在南安九日山创“九日山书院”，又先后在同安、漳州、晋江、崇安、建阳等地倡建书院。当时整个社会都重视攻读苦学，读书风气极为浓厚，各种学校遍布城乡，莆田有“三家两书堂”之谚，福州也“最忆市桥灯火静，巷南巷北读书声”，连山区泰宁也“比屋连墙，弦诵相闻”，一时有“闽之儒风，甲于东南”之誉。元代教育虽受影响，但福州仍有“勉斋书院”。明清学校和科举紧密结合，科举必由学校，进学校成了科举的必由之路，福建的教育更为兴盛。明代著名书院有福州的“共学书院”和黄道周在漳浦、漳州建立的“文明书院”、“邗山书院”，清代福州有全省性的鳌峰、凤池、正谊、致用四所书院，近代福建教育除了传统的书院外，还出现了官办的全闽大学堂、洋务派办的船政学堂，以及外国教会办的格致书院。教育的长期兴盛使闽人的文化素养得以提高，这无疑有助于文学创作。

理学的盛行对福建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福建是理学的故乡，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宋以后的福建文化，其实就是理学。这种

见解如仅指思想领域，也是有道理的。朱熹以儒学为主体而融合佛、道，他的理学体现了儒、佛、道在理论上的交汇。儒学注重人在社会生活中自我价值的实现，佛教注重人在内在精神生活中的心理满足，道教注重人在生命上的永恒与愉快，朱熹将它们改造为一种新的思想，后来也被称为闽学。理学对福建作家的影响主要可从三个方面看：首先，从思想影响上看，福建理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，其积极方面如以天下为己任、生活刻苦、讲究民族气节、以民本为核心谋求社会进步、敢于创新等，闽地很少文学家不受其熏陶，因此福建爱国作家多、遗民诗人多，如宋代的李纲、谢翱、郑思肖，明代的俞大猷、黄道周，元代的洪希文，近代的林则徐、张际亮、林昌彝等。其次，从作家队伍组成上看，许多著名作家本身也是理学家，是朱子学说的研究者和传播者，如宋代的真德秀，元代的黄镇成、陈旅，明代的林希元、黄道周，清代的李光地、孟超然，近代的刘存仁、辜汤生等。即使是终身从事理学研究的朱子门人，也多有诗文传世，如宋代黄干有《勉斋诗钞》，元代熊禾有《勿轩诗集》、陈普有《石堂先生诗》，吴海有《闻过斋诗集》等。再次，从学风上看，由于福建的理学传播者穷年累月地精研儒家经典，并以教授传经为己任，所以也对福建文坛带来消极影响。一是使不少极有才华，完全可以驰骋文坛的文人却将一生的精力役于此，致使创作不多、深入不得；二是理学毕竟是抽象思维，它的传播束缚了不少文学家的形象思维，致使不少诗文缺乏灵气。

福建是中国罕见的艺术聚宝盆，浸其中的福建作家受到耳濡目染的影响，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。仅以绘画和戏曲为例，亦可看出艺术对福建作家的巨大影响。（一）绘画。福建风景秀丽，在重视诗书同时，许多人还善绘丹青，以至诏安、仙游等处